

# 战时沦陷区散文的苦吟

汪文顶

**内容提要** 抗战时期沦陷区散文流行着书卷化、世俗化和诗化的三种主要倾向。书卷化随笔以周作人为典范,世俗化絮语散文数张爱玲略胜一筹,诗化散文有南星等传承何其芳余脉,从知性、感性和诗性诸层面拓展散文随笔在沦陷区艰难生长的空间,形成了特有的普遍的苦吟风和苦涩味。这为战时中国散文多样性发展提供了别样的乱世哀音、遗民心曲和文体艺术,具有不可忽略的存在价值和文史意义。

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因战局变化而形成国统区、陕甘宁边区与敌后抗日根据地、沦陷区等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区域,相应形成不同的文学生态和散文景观。日寇侵占我国东北、华北、华东、华中大片地区后,在占领区实行殖民统治,奴役和分化中国人。沦陷区亿万民众在敌伪法西斯统治的艰险环境中,虽有部分爱国志士投身于地下抗日斗争,但大多只能委曲求生,苦熬待旦。也有一些民族败类,沦为卖国投敌的汉奸。滞留或成长于沦陷区的文化人,也大体分化为前述三种状况。由于环境险恶,抗日文学不容生存,许多爱国作家只能蛰居封笔,只有部分作品曲折地蕴涵着民族抗争意识。因此,沦陷区散文流行的主要是日常人生的体味,内心感慨的吟咏,故人往事的怀想,文史掌故的漫谈,有意回避民族战争、社会矛盾等现实敏感问题,注重个人感怀和艺术经营,大多带有避重就轻、苦吟低唱的别一格调。

沦陷区散文名家大多聚集于华北和华东地区。北京、天津、南京、上海相继沦陷后,原先的文学期刊几乎都被迫迁移或停刊了。随后新办的报刊和出版机构大多受日伪势力扶植与控制。侧重散文随笔的期刊,北京有方纪生编辑的《朔风》(1938)、张深切主编的《中国文艺》(1939)、周作人主持的《艺文杂志》(1943)等;上海有吴诚之主编的《杂志》(1941)、周黎庵主编的《古今》(1942)、柳雨生主编的《风雨谈》(1943)、苏青主编的《天地》(1943)等。北京新民印书馆、上海太平书局等陆续出版了五十来种散文随

笔集,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周作人的《药味集》和《药堂杂文》、柳雨生的《怀乡记》、纪果庵的《两都集》、文载道的《风土小记》和《文抄》、苏青的《浣锦集》、张爱玲的《流言》、南星的《松堂集》、林榕的《远人集》等,在散文史上理应补记一笔<sup>①</sup>。本文选评上述八家散文,着重考察沦陷区散文书卷化、世俗化和诗化的发展变化。

## 一 知堂风随笔的书卷化

沦陷区散文自始至终流行着以周作人为代表的文史随笔,主要作家还有柳雨生、纪果庵、文载道等,沿袭战前“知堂风”而更趋于书卷化和知性化。

周作人从新文化先驱沦落为汉奸文人的代表,令人叹惜和不齿。他在沦陷初期还想躲在“苦雨斋”卖文为生,以文化界苏武自诩,却经不起敌伪的威逼利诱,半年后就出席日伪召开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一年半后就失节投敌,出任伪华北教育总署督办等伪职。他以伪官身份写过一些宣扬“东亚共荣”的所谓“应酬文章”,他自己也羞于收集。而结集出版的《药堂语录》(1941)、《药味集》(1942)、《药堂杂文》(1944)、《书房一角》(1944)、《苦口甘口》(1944)和《立春以前》(1945)等,在延续他30年代闲适文风的基础上,增添了一些“正经文章”,加重了几分“苦药”味。

周作人在自编文集序跋和《两个鬼的文章》

诸文中一再说明自己的散文随笔有两大类,一类是“平淡而有情味”的只谈“吃茶喝酒”、“草木虫鱼”的用来“消遣调剂”的“闲适的小品”,犹如“茶”和“酒”,自称不是他的“主要的工作”;另一类则是“爱讲顾亭林所谓国家治乱之原,生民根本之计”的“正经文章”,自以为这是他写作的绝大部分,像“馒头或大米饭”,是他的“最贵重的贡献”。

周作人这时的“正经文章”,主要有《药堂杂文》中的《汉文学的传统》、《中国的思想问题》、《汉文学上的两种思想》和《汉文学的前途》四文,以及《苦口甘口》第一辑收录的《梦想之一》、《文艺复兴之梦》、《我的杂学》等十篇。这些文章梳理自己对中外文化思想的贯通和见识,诚有经世致用的“资治”目的。代表作《中国的思想问题》,着重阐发“以孔孟为代表,禹稷为模范”的原始儒家思想,认为“儒家的根本思想是仁,分别之为忠恕”,“仁即是把他人当做人看待,不但消极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还要以己所欲施于人”;其“根本”不仅源于生物本能的“求生意志”,还出自“人所独有的生存道德”,“从浅处说这是根据于生物的求生本能,但因此其根本也就够深了,再从高处说,使物我各得其所,是圣人之用心,却也是匹夫匹妇所能着力,全然顺应物理人情,别无一点不自然的地方”。他认为这是中国人固有的“健全的思想”,“在现今百事不容乐观的时代,只这一点我觉得可以乐观”。然而,让他“忧虑”的是,“中国人民生活的要求是很简单的,但也就很切迫,他希求生存,他的生存的道德不愿损人以利己,却也不能如圣人的损己以利人。……他不肯为了神或为了道而牺牲,但是他有时也会蹈汤火而不辞,假如他感觉生存无望的时候,所谓铤而走险,急将安择也”,“中国人民平常爱好和平,有时似乎过于忍受,但是到了横决的时候,却又变了模样,将原来的思想态度完全抛在九霄云外,反对的发挥出野性来,可是这又怪谁来呢?俗语云,相骂无好言,相打无好拳。以不仁召不仁,不亦宜乎。现在我们重复说,中国思想别无问题,重要的只是在防乱,而防乱则首在防造乱,此其责盖在政治而不在教化”。文中既有回归儒家仁学根底的见识和期望,又有生物学、人类学、民俗学诸类“物理人情”的依据和

说教,还有对统治者“防民乱”的献策和“防造乱”的讽喻,引经据典,忧生悯乱,可谓苦口婆心而又难免对牛弹琴之讥。

周作人这时写了更多的读书笔记,也着眼于摘抄和点评明清笔记中顺应物理人情、有益经世致用的片言只语。在1943年所作《〈一蓑轩笔记〉序》中,他说1937年秋冬间“翻阅古人笔记消遣”,总共看了六十二部六百六十二卷,“记录看过中意的篇名,计六百五十八则,分配起来一卷不及一条”;选择标准有两条:“其一有风趣,其二有常识,常识分开来说,不外人情与物理,前者可以说是健全的道德,后者是正确的智识,合起来就可称之为智慧,比常识似稍适切亦未可知。”由此可见,其文抄可谓披沙拣金,自有别择识见和良苦用心,不只是消闲自娱而已。他再三引录《孟子·离娄下》中一节并征引清人焦循、刘献廷、俞正燮诸家笔记的相关片段,寻思儒家仁学本色,既有正本清源的用意,又有体恤民瘼的修辞,还有为己辩解的苦心,含蕴曲折丰富。他在读书笔记中一再称道汉代王充、明代李贽、清代俞正燮三人的“疾虚妄”精神,认为“疾虚妄的对面是爱真实,鄙人窃愿致力于此,凡有所记述,必须为自己所深知确信者,才敢著笔,此立言谨慎的态度,自信亦为儒家所必有者也”(《〈药味集〉序》)。并在《我的杂学》中总结说:“中国现今紧要的事有两件,一是伦理之自然化,二是道义之事功化。前者是根据现代人类的知识调整中国固有的思想,后者是实践自己所有的理想适应中国现在的需要,都是必要的事。此即是我杂学之归结点。”其中,固然有发掘传统、返本归真的“窃愿”,却也潜藏着改造传统、曲为自辩的苦衷。

周作人还写了一批忆旧感怀的随笔,收入《药味集》、《苦口甘口》、《立春以前》、《过去的工作》(1959)和《知堂乙酉文编》(1961)诸集。《炒栗子》一文,以几则书摘转述北宋炒栗名手李和在汴京被金兵攻破后流落燕山、向南宋使者进献炒栗的故事,并引录落水前夕自作的两首七绝:“燕山柳色太凄迷,话到家园一泪垂。长向行人供炒栗,伤心最是李和儿”,“家祭年年总是虚,乃翁心愿竟何如。故园未毁不归去,怕出偏门遇鲁墟”,含蓄抒发乱世遗民的黍离忧思。《雨

的感想》则真切回味故乡雨天的情趣，因有河流、小船、石板路等缘故，“下雨无论久暂，道路不会泥泞，院落不会积水，用不着什么忧虑”，而有书室听雨、急雨打篷、雨中步行、钉鞋嘎嘎诸种乡土风情，使苦雨斋主人倍感有趣和慰藉。《无生老母的消息》写于抗战胜利前夕，在沦陷区人民期盼解放之际，他借民间信仰的解读而传唱的《盼望歌》，却是“无生母，在家乡，想起婴儿泪汪汪。传书寄信还家罢，休在苦海只顾贪。归净土，赴灵山，母子相逢坐金莲”，“无生老母当阳坐，驾定一只大法船，单渡失乡儿和女，赴命归根早还源”之类传教歌诀，不禁动情地抒写道：“经里说无生老母是人类的始祖，东土人民都是她的儿女，只因失乡迷路，流落在外，现在如能接收她的书信或答应她的呼唤，便可回转家乡，到老母身边去，绅士淑女们听了当然只觉得好笑，可是在一般劳苦的男妇，眼看着挣扎到头没有出路……忽然听见这么一种福音，这是多么大的一个安慰。不但他们自己是皇胎儿女，而且老母还那么泪汪汪的想念，一声儿一声女的叫唤着，怎不令人感到兴奋感激，仿佛得到安心立命的地方。”这有感同身受的理解和同情，也有己在其中的感慨和祈求，还有集游子逆子于一身、借他人酒杯浇胸中块垒的苦楚和排遣，很能表现沉沦没顶之际惶惑悲哀的心曲。

在《立春以前》的跋文中，周作人自称：“我对于中国民族前途向来感觉一种忧惧，近年自然更甚，不但因为己亦在人中，有沦胥及溺之感，也觉得个人捐弃其心力以至身命，为众生谋利益至少也为之有所计议，乃是中国传统的道德，凡智识阶级均应以此为准则，如经传所广说。我的力量极是薄弱，所能做的也只是稍有议论而已。”剔除其中的自诩成分，倒是符合他沦落时期的思想心理和写作实际，也代表了一批落水文人的普遍心态。他们与汉奸政客有点差别，背负的思想负担较重，内心顾忌较多，以文附逆之际，还有白纸黑字的忌惮，既不得不多加修饰和掩藏自己的心思，又不能不显示一点自己的见识和专长，从而形成亦真亦假、似藏似露的群体作风。周作人沦陷期的坐而论道，起而事伪，显然是丧失气节、有辱斯文的行为，文中却有苦口药味，沦胥哀音，加上文体老到，含蕴曲折，充分体现了附

逆文人特别复杂纠结的心态。若不因人废文，还是具有品鉴惕戒的文史价值。

柳雨生是周作人执掌北大文学院伪职时的毕业生，沦陷期在上海依附敌伪，创办《风雨谈》月刊，协办太平书局。他在1940年上海沦陷前出过文史随笔《西星集》；1944年结集出版的《怀乡记》收录散文25篇。其中，失足前所写《汉园梦》一组作品，忆述北大旧事逸闻，从教学和生活琐事的娓娓漫谈中，勾勒出胡适、钱穆为代表的两类教授或动或静、或仁或智的多样风采，映现了北大自由民主、包容阔大的精神气象，可谓令人神往的汉园梦。而压卷的《怀乡记》一组三篇长文《异国心影录》、《海客谈瀛录》和《女画录》，均为附逆后应邀参加“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访日随笔。其“心影”转变为“像一头没有家的小猫”在异国交游之际“心里异样的感触”。主要记述与日本“文学报国会”一批军国主义作家交往的印象和情谊，以及游览所见的风物民俗，贯穿着“亲善”、“共荣”之文心。他在《异国心影录》中自诩：“我之所以要写这篇东西，是代表了一个十足的真实的中国人应该有的举动”，而三文一冉再申述的却是：“我想，做人的道理，最高尚的是应该超乎以德报德的恩仇的观念之外的。一个人是如此，一个民族国家其实也是如此”，“我们不但应该以德报德，并且应该用投饲饿虎的伟大精神，用一切的努力，去拯救宇宙全人类正在挣扎苦痛中的水深火热的生活”；“现在中国的局面，是破碎的，消极的说，我们所想谋的是安定保全，并不见得就是‘偏安’。积极的说，我们要想从根本上使日本的国民明瞭中国，认识中国四十年来争取自由平等的奋斗，中国强盛了，对于日本决无什么不友善的地方，日本对中国好，是利无弊的，而中国的同胞们，也要反躬自省，努力研究日本，努力了解日本的国民性，生活，习惯，思想，社会人物，和其所以能够强盛之道”。这样的“心影”比周作人和其他附逆文人直白露骨得多，堪称典型的大言不惭的媚敌说辞。

纪果庵于1933年大学毕业后，曾任北京孔德学校、宣化师范学校教员。1940年后，受汉奸樊仲云的拉拢和提携，南下出任南京汪伪政府教育部秘书等伪职。他在沦陷期写了上百篇散文随笔，1944年出版的《两都集》仅收30篇；此外结集为

《篁轩杂记》，当时曾预告出版，却延搁至2009年，才编入同名散文选集，并有后人辑编的文史随笔集《不执室杂记》，均由台北秀威出版社印行。

纪果庵由北入南，写起《两都赋》，自有比较视野和历史沧桑感。开篇立意，“南京虽老而新，北京似近而颇古”，一语总括两都的历史特点，统领全文的脉络关节。在铺陈比较两都建置、风物、文化、吃住、娱乐诸方面的差别和优劣之中，“对于旧都起莫名的怀念，恰似游子之忆家乡”，也感叹“南京是太不幸了，在近一百年中，不知遭逢多少次兵灾战祸”，“可惜这次事变，只剩下些烧毁的残骸，在晚照中孤立着。尤其是自下关进城，首先看到交通部原址，那美奂美仑的彩色梁栋，与炸药的黑烟同时入目增愁，不禁令人生‘无常’之感”。遭逢战乱，生民涂炭，他在忍辱偷生之中，禁不住怀念升平年代的风土民俗，写出《语稼》、《风土小谭》、《林渊杂记》、《北平的味儿》等怀旧文章。《林渊杂记》引“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入题，一往情深地怀想回味故乡社戏、庙会、节庆的繁华欢乐景象，而结句以“满目悲生事”留下现实的深长慨叹，诚如该文开头为乡愁、清谈、颓废一类文字所辩解的那样：“我想颓废之后也未尝没有苦痛，苦痛而作为颓废的样子表现出来，乃是更深的苦痛，或即是苦闷”。这是其文含蕴顿挫之所在，比沦陷区其他同道更深切地体味到世变之伤，黍离之悲。在《不执室杂记·〈两都集〉跋》中，他解释说：“怀旧之感，依恋之情，每当乱世，人所愈增，师友凋零，亲戚走散，一也；民生艰苦，弥念太平，二也；兵戈遍地，无所求生，穷则反本，旧亦本也，三也。凡此诸情，若不得泻，亦是苦恼，或则讥为清谈无用，或诟为遁逃避世，不知今日之罪，不在清言，而在浑浊，不在遁避，而在贪得也。”这切合其人生体验和创作心理，也能体现委曲求生者的深长苦衷和微渺梦想。

纪果庵在《篁轩杂记》自序说：“回忆之文，乃儿时照像，说理之文，乃今日摄影，儿时照像可供今日指点，今日摄影，不亦后此翻检之资乎？”在怀旧伤今的同时，他还谈古道今，以史遣愁。他学周作人，写起读书笔记，有《风尘瀕洞室日抄》、《不执室杂记》、《孽海花人物漫谈》诸系列，杂览摘抄，也注重人情物理，颇有知堂风。

单篇的《论“从容就死”》、《论不近人情》、《谈文字狱》、《说设身处地》、《说饮食男女》等，对典故成说的辨析较为绵密通达，往往借古喻今，谈言微中。论“从容就死”之难，引述种种死法，悲喜交织，庄谐杂出，辨明死之“不能从容”“乃人情之常”“却又有分寸”的道理，嘲讽“封疆大吏可以卷款逃走，而老百姓却尽着为国捐躯的义务”的现实，认同“平民大可贪生，官吏不当畏死”的主张，隐含为乱世民生辩解的意味。谈“不近人情”，则揭开人情世故的面纱，“实即不甚合乎感情的一种礼法”，“近了人情即是世故”，“实在即是欺骗，似不近也不妨”，“上述乃是指人情之不情者言，亦即说人情有时成了束缚，在受者与投者两方皆无任何便利与意义；理应废止，或说，‘不近’一点，也算不得什么稀奇。假使不是如此，而尽量为迎合设想，终其目的，也还是为了自己的利益，那种人情，更其无谓”，从而申述“自甘心于不近人情”的心曲。此类知性随笔，絮语漫谈之中时有自得之见和幽默谐趣。

文载道，原名金性尧，于上海沦陷时从《鲁迅风》主干转变为《古今》编辑和《文史》主编，卷入附逆漩涡而负疚不已。他在沦陷期所作散文随笔，辑为《风土小记》和《文抄》，分别由太平书局和新民印书馆于1944年出版。周作人为《文抄》作序，把文载道与纪果庵相提并论，说他俩的散文均有“土风民俗”、“流连光景”的倾向，是“文情俱胜的随笔”，属于“忧患时的闲适”之“文学的一式样”。

文载道在《风土小记》跋文自称：“似乎《文抄》是说理多于抒情，而本集则抒情多于说理。”《文抄》收录《知人论世》、《借古话今》、《读闲书》、《魏晋人物志》等文史随笔，追随知堂风而未臻淹博练达之境。相比较而言，《风土小记》也有知堂风味而更具个人特色。开卷首篇《关于风土人情》，以夹叙夹议之笔，在吟咏乡土人情的同时，也伤逝叹今，情理交融。他既有“风土人情之恋”，“亦有感于胜会之不再，与时序的代谢，诚有宁为太平犬，莫作乱离民之感”，还有“欲说还休的无言之恸”，“最可悲矜的”“‘孤臣孽子’之心”，如此繁复翻腾的情思聚集笔端，成就了“文情并茂转折多姿”的一篇佳构。“我以为一切记载风土、节候、景物的著述，也以出诸遗民的

笔下者最有声色。无论写景，记物，道故实，谈胜迹，虽然娓娓道来，却无不含着至性至情，成为‘笔锋常带情感’之作”，“所以杜少陵的城春草木之悲，李后主的小楼东风之痛，就成为俯视百代的绝唱了”，“人们在‘天翻地覆的大变动’之后，所留下来的，却是经过千锤百炼之余的一种生的执著，如陆士衡所谓‘嗟大恋之所存，故虽哲而不忘’者是也”。这样的感兴咏怀，抒情究理，情理相生，比文末的直白说理更耐人寻味，确与纪果庵的《林渊杂记》可相媲美，而带有情理交融的个人特长。

《风土小记》中也有一组读书随笔，比《文抄》更注重情境理致的营造。《夜读》承传知堂《夜读抄》文风，畅谈书斋的难得可贵，灯火的澄明亲切，最宜夜读的秋冬情境，午夜可听的天籁人声，古人读书的流风余韵，儿时夜读的甘苦温馨，以及与书斋有关的逸闻趣事，营造出夜读的诗意雅趣，表达了自己“喜博览泛阅”的夜读嗜好。其中，唯有斋名从“星屋”改为“辱斋”，隐含乱世忍辱的苦衷。《雪夜闭门读禁书》则借此诗题谈论文字狱史，例举从汉魏到明清的几桩惨案，剖析专制帝王残暴而又虚弱的阴暗心理，印证“历史是一座孽镜台”，“二十四史是一部相斲史”，进而透视“自经这些残压之后，一面固然使民间战战兢兢的奉命唯谨，不敢有丝毫的怀二。但一面究也增加士子一点愤慨和牢骚。而且按诸情理，也以前者为勉强的迫抑，后者是自然的反应。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就因脑髓积较畜生来得深，一深，就表示思想的复杂，而决非单纯的威权所能肃清”。这就升华了雪夜闭门读禁书的诗境，留了他初期“鲁迅风”杂文的理趣和辣味。

文载道与纪果庵的随笔都私淑“知堂风”，从记忆与书卷里搜寻写作材料，于清谈闲话之中寄寓悲感苦味，诚有“文情俱胜”的特色。相比较而言，纪氏较为沉郁蕴藉，更近似周氏当时文风；金氏较为疏放畅达，情理交织而才气流溢，似有周氏早年风采。“北纪南金”，都与周作人同气相求，都以乱世遗民自诩，以文史随笔见长。他们在敌伪治下苟且偷生，作文自遣，绕弯子说话，娓娓闲谈而又欲说还休，借旧典故实浇心中块垒，貌似闲适而蕴含复杂深切的苦涩味，代表了沦陷区随笔体书卷气散文的普遍作风。

## 二 絮语散文的世俗化

沦陷区散文中絮语日常生活体验而趋于世俗化、市民化的，以上海沦陷时期出名的女作家苏青和张爱玲为代表。

苏青，1935年开始以原名冯和仪在《论语》、《宇宙风》等期刊发表作品。上海沦陷后，因婚变而自立，创办《天地》月刊与天地出版社，改用笔名苏青卖文谋生，著有自传体长篇小说《结婚十年》、《续结婚十年》和散文集《浣锦集》（1944）、《饮食男女》（1945）等，流行一时，成为与张爱玲齐名的女作家。

苏青被称为“大胆女作家”，缘于其写作勇于自曝隐秘，放言无忌，写出乱世才女的辛酸遭遇和女性自立的实际诉求。这不仅充分表现在她的自传体小说之中，在谈论饮食男女、家常琐事的随笔中也快人快语，直言无讳。她在《古今》上发表《论离婚》和《再论离婚》姐妹篇，后者比前者更深切地体验到离婚女人的艰辛痛苦，“娜拉并不是容易做的，娜拉离开了家庭，便是‘四海虽大，无容身之所’了”，“离婚在她们看来绝不是所谓光荣的奋斗，而是必不得已的，痛苦的挣扎”，“不挣扎，便是死亡；挣扎了，也许仍是死亡”，“人总想死里逃生的呀！”“一个女子在必不得已的时候，请求离婚是必须的。不过在请求离婚的时候，先得自己有能力，有勇气。至于离婚以后怎么样呢？我以为也不必过虑。一个有能力，有勇气的女子自能争取其他爱情或事业上的胜利；即使失败了，也能忍受失败后的悲哀与痛苦。假如她因没有能力或决心而不敢想到离婚，或者虽想到而不敢说，或者只说而不敢做，那便只好一世做奴才了。”她把离婚的艰难推至极处，又把怕离婚的心理捉摸透了，从而强调离婚的必备条件“先得自己有能力，有勇气”，否则“只好一世做奴才”，为女性自主自立提供了经验之谈和理智选择。

她在《天地》上发表的《谈女人》和《谈男人》，具有相映成趣的互文性，更大胆更充分地表现她的两性观：“许多男子都瞧不起女人，以为女人的智慧较差，因此只合玩玩而已；殊不知正当他自以为在玩她的时候，事实上却早已给她玩弄去了”；“女子不大可能爱男人，她们只能爱着男

子遗下的最微细的一个细胞——精子，利用它，她们于是造成了可爱的孩子，永远安慰她们的寂寞，永远填补她们的空虚，永远给与她们以生命之火”；“有人说：女子有母性与娼妇两型，我们究竟学母性型好呢？还是怎么样？我敢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女人不想永久学娼妇型的，但是结果不可能，只好变成母性型了。在无可奈何时，孩子是女人最后的安慰，也是最大的安慰”；“为女人打算，最合理想的生活，应该是：婚姻取消，同居自由，生出孩子来则归母亲抚养，而由国家津贴费用”（《谈女人》）。“人人都说这个世界是男人的世界，只有男人在你争我夺”，“其实这些争夺的动机都是为女人而起；他们也许不自觉，但是我相信那是千真万确的”，“因为没有女子不羡慕虚荣，因此男人们都虚荣起来了”；“愿普天下女人少虚荣一些吧，也可以让男人减少些罪恶，男人就是这样一种可怜而又可恶的动物呀”（《谈男人》）。这些名句有些惊世骇俗，是此前女性作家在散文中难以启齿的，她却侃侃而谈，谈出自己眼中两性的同异优劣，直抵心理欲望的隐秘之处，对男性的卑劣予以嘲讽，对同性的虚荣也有讽喻，而为女人谋权益的心意倒是说得入情入理，头头是道，并不高蹈夸张。她自白：“《浣锦集》里所表现的思想是中庸的，反对太新也反对太旧，只主张维持现状而加以改良便是了。”<sup>②</sup>张爱玲评说她的写作“没有过人的理性。她的理性不过是常识——虽然常识也正是难得的东西”<sup>③</sup>。

苏青在《〈天地〉发刊词》中提倡“女子写作”，并提出五条理由：“盖写文章以情感为生，而女子最重感情，此其宜于写作理由一；写文章无时间及地点之限制，不妨碍女子的家庭工作，此理由二；写文章最忌虚伪，而女子因社会地位不高，不必多所顾忌，写来自较率真，此理由三；文章乃是笔谈，而女子顶爱道东家长，西家短的，正可在此大谈特谈，此理由四；还有最后也就是最大的一个理由，便是女子的负担较轻，著书非为稻粱谋，因此可以有感便写，无话拉倒，固不必如职业文人般，有勉强为之痛苦也。”她的女性文学观自觉意识到女子写作的便利和特长，前四条也大致切合她自己的写作实际。她还认为：“散文可以叙述，可以议论，可以夹叙夹议，文体严肃亦可，活泼亦可，但希望严肃勿失之呆板，活

泼勿流于油腔滑调而已。编者原是不学无术的人，初不知高深哲理为何物，亦不知圣贤性情为何如也，故只求大家以常人地位说常人的话，举凡生活之甘苦，名利之得失，爱情之变迁，事业之成败等等，均无不可谈，且谈之不厌。”<sup>④</sup>她主张“以常人地位说常人的话”，拉近散文与凡俗、作者与读者的距离，对沦陷区散文流行的知堂风和书卷气有所规避，开拓了世俗化市井随笔的写作天地。

张爱玲于1939年赴香港大学求学，香港陷落后中断学业回到上海沦陷区，专事写作，以小说《倾城之恋》、《金锁记》知名于文坛，并著有散文集《流言》（1944）。《流言》收1943—1944年所作散文30篇，与苏青一样关注世俗人生和女性境况，但她侧重从个人感性体验来把握日常生活和生存经验，“从柴米油盐，肥皂，水与太阳之中去找寻实际的人生”（《必也正名乎》），以“私语”絮叨着“可爱又可哀的年月呵”（《私语》）。

《私语》和《童言无忌》二文，自述儿时家中浮华生涯中的变故、没落、阴暗和抑郁，揭开童年心理挫伤留下的精神疤痕。因父母离异，她与后母冲突，被父亲监禁在空房里，“我生在里面的这座房屋忽然变成生疏的了，像月光底下，黑影中现出青白的粉墙，片面的，癫狂的”，“数星期内我已经老了许多年。我把手紧紧捏着阳台上的木栏杆，仿佛木头上可以榨出水来”。寻机逃出门之际，“当真立在人行道上了！没有风，只有阴历年左近的寂寂的冷，街灯下只看见一片寒灰，但是多么可亲的世界啊！我在街沿急急走着，每一脚踏在地上都是一个响亮的吻”。这“私语”发自内心深处，保留原有鲜活的感觉和意象，道出前后两重天的深切感受和家人亲情伦理的可怕真相，说来特别悲凉酸楚。

《烬余录》、《公寓生活记趣》和《道路以目》诸篇，细说港沪战时生活的五光十色，最能体现她的现实感：“现实这样东西是没有系统的，像七八个话匣子同时开唱，各唱各的，打成一片混沌。”她经历过香港陷落的动荡生活，两年后写起《烬余录》，已把战争推至背景，而将港大一群女同学的各种表现推向前台。大家尽管经受着空袭的惊吓，围城的困窘，伤亡的威胁，也参加了防空和看护的辅助工作，但除了个别同学变得干练了，“我们大多数的学生”，“对于战争所抱的态

度，可以打个譬喻，是像一个人坐在硬板凳上打瞌睡，虽然不舒服，而且没结没完地抱怨着，到底还是睡着了”，“我们总算吃够了苦，比较知道轻重了。可是‘轻重’这两个字，也难讲……去掉了这一切浮文，剩下的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人类的文明努力要跳出单纯的兽性生活的圈子，几千年来的努力竟是枉费精神么？”“时代的车轰轰地往前开。我们坐在车上，经过的也许不过是几条熟悉的街衢，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惊心动魄。就可惜我们只顾忙着在一瞥即逝的店铺的橱窗里找寻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我们的自私与空虚，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谁都像我们一样，然而我们每一个都是孤独的。”这对劫后余生、战时人性的拷问，既冷峻又哀悯，还带点事后省察的幽默和自嘲。

《公寓生活记趣》则于日常生活中寻味乐趣，“许多身边杂事自有它们的愉快性质。看不到田园里的茄子，到菜场上去看看也好”。她在《道路以目》中进而发挥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我们从家里上办公室，上学校，上小菜场，每天走上一里路，走个一二十年，也有几千里地；若是每一趟走过那条街，都仿佛是第一次认路似的，看着什么都觉得新鲜稀罕，就不至于‘视而不见’了，那也就跟‘行万里路’差不多，何必一定要漂洋过海呢？”她在市井凡俗生活中寻美享乐，也从服饰、绘画、音乐、舞会、戏曲等艺术生活中品味人生，如《更衣记》、《谈跳舞》、《谈音乐》、《谈画》等篇，诚如《洋人看京戏及其他》开头所云：“用洋人看京戏的眼光来看看中国的一切，也不失为一桩有意味的事。”这类别具只眼、别有会心的絮语散文，很能体现这位都市才女玩味身边琐事的才情品位。

张爱玲散文以感性私语见长，比苏青散文更细腻鲜活，妩媚多姿，富于个人化、女人味和艺术性。但在女性话题上不如苏青的明澈真切，她的《谈女人》多引述他人的名言，自己的感悟虽有一些警句，也不免纸上得来终觉浅，与苏青的同题之作不可相提并论。但她俩的女性絮语，都贴近庸常凡俗，回归女人趣味，小题细作，说长道短，平中见奇，俗中有雅，于现代女性文学浪漫与启蒙话语之外，另辟女性散文世俗化、女人化、私语化的发展空间。

### 三 小品散文的诗化

战前何其芳《画梦录》一脉诗化散文，在战时大后方和沦陷区都得以传承发展。当时就有论者指出：“有多少人说过了，何其芳的《画梦录》的文体支配了事变以后北方散文的趋势。”<sup>⑤</sup>其实，支配华北沦陷区散文的首推知堂风随笔，其次才是何其芳的诗化唯美文风，可举南星、林榕二家为代表。

南星在战前已有诗名，出版过诗集《石像辞》。战时曾任北大英语系讲师，与路易士、杨桦合编过《文艺世纪》，著有诗集《离失集》、《春怨集》和散文集《蠹鱼集》、《松堂集》。《蠹鱼集》署名林栖，1941年由北京沙漠书报社初版，所收28篇小品大多又收入1945年新民印书馆初版的《松堂集》。

南星以写诗的态度创作散文，把现代派诗风带入散文，走的是战前何其芳的诗文之路，成为沦陷区诗化散文的代表。《松堂集》内分五辑共收35篇。前四辑为诗化散文，吟咏风物友情，抒写内心感兴，营造沉思独语、微妙精致的诗境。第五辑为文艺随笔，品评小泉八云、劳伦斯、霍斯曼、泰戈尔、露加斯（卢卡斯）、白洛克等名家名作。

《蠹鱼》所想念的“一个远方的荒城”，当是他大学毕业后前往任教一年的贵阳花溪。尽管当时深感在异乡的孤独寂寞，过后思量，“记忆永远是有所选择，仅仅把可喜的情景留下，而舍弃多量的烦忧，近来习惯于喧嚣和尘土的生活，那座荒城也竟令人想念了”。尤其是那里的田园风味，城中田地“禾苗如同美丽的海浪，一直涌到城墙的尽头”，“城外更是无边际的碧绿了”；这与当下北京古城的生活，“在街上，过多的声音，过多的车马，过多的同行者，以尘土互相馈赠。在屋里，一行行陈旧的书籍，每天作重复的絮谈”，形成鲜明的对照；他不禁喊出内心的呼声：“给我那孤独吧，但是，也给我那丰富的田野吧”，并吟诵起英国田园诗人德拉梅尔的诗句：“我又想念绿的田野来了，我厌烦书籍了”。文中“远方的荒城”与“都市的城”的场景对照，强化了他对现实境况的不满和无奈，对田园诗境的沉迷和追寻。他在《寒日》中吟咏过：“阴暗而庄严的岁月来了。一切我所盼望的所珍惜的都在远处”，一语透露他在



沦陷区现实生存与理想追求的矛盾与反差。

《松堂》则从京郊山野中寻味诗趣。对于西山的松堂,已有不少诗文吟咏过,南星的感觉以“亲切”为基调:虽有“身入石洞之感”,却“觉得对它有些亲切,因为看见不久将供我休息的一张床了。我的安心让我几乎闲暇地把屋角和屋顶都审视了一回,仿佛是一个初到新居的租客”;“这古老的石屋仍有它的不可思议的抚慰我的力量”;“我和PH先是静默地坐着,后来开始闲谈,语声在各人耳中变得沉重起来,我们觉得奇怪,它们几乎不像自己的了。因为石墙么,或山中的黑夜么?我们似乎都做了故事里的人物”;“我尽力吸着掩住山的气息的田野气息。这第一次来到的地方像变了旧相识似的,我对于两旁田地中的伫立者觉得异常亲近,甚至让脚步慢下来”。这幽微细腻、真切敏锐的感觉,不是一般游者的普泛观感,而是行吟诗人找回的乡野的特有温情,聊作寂寞中的一丝慰藉;是随时随处都在寻味诗意的感兴,给日常灰色人生添加一点灵光。他在《家宅》一文中自白:“为甚么不能把心思寄托在另外的东西上,或者以现在的住处为家呢?这似乎不可解释,也许总与自己的生活方式有关吧。不能与广大的人群结缘,没有独特的癖好,也没有崇高的想象,最能影响我的感觉的都在耳目之间;风的或雨雪的日子让我兴奋或忧伤,秋冬的阳光给我以多量的安静,屋门对面的墙垣之剥落也是一件缠绕在心上的事。”他在“阴暗与庄严的岁月”中,仍固守自己的诗心,孤寂地咀嚼幽微的感觉和辽远的想象,俨然精神贵族般的葆有精神生活的丰富自足。

南星在《谈露加斯》的随笔中体会道:“写文章最不可少的是真实。一个散文作家可以有一千种写法,夸张也好,取材于别人也好,纯想象也好,这里面仍然有真实。换句话说,作者不应该为取得大家的欢心而不忠于自己的思想。”他的散文确实保持着诗人的天真,忘怀世事而专注内心,对身边琐事和心理变幻特别敏感,潜心吟味感觉和想象以营造幽玄空灵的诗境,在象牙之塔中沉思独语,精雕细琢,讲求艺术表现的精美,格局不大而精致有余。他在沦陷区传承战前京派散文尤其是何其芳诗化散文的流脉,于书卷气、世俗化之外拓展散文诗化之路,也与战时大后方诗化散文遥相呼应,共同维系了散文艺术的诗性品位。

• 106 •

林榕,还用过林慧文、楚天阔、慕容慧文、上官蓉等笔名。1937年入辅仁大学国文系,开展校园文艺活动,毕业后任北大中文系助教,接编《中国文艺》,著有散文集《远人集》(1943)和评论集《夜书》(1945)。

《远人集》与南星《松堂集》类似,以诗为文,即景咏怀,但带有青年人的敏感多情和天真幻想。所收1938—1942年间的散文小品30篇,作者在《后记》解释书名说:“我有着对无数远方友人思念的心情,所以常有所感,在寂寞岁月中,遂记下当时的感触。这并不是简单的对景生情,更没有繁屑的身边琐事。我总觉得在这心情的里面,有我自己的影子,也有我周围的环境与社会。”他滞留古城就读教会大学,从事文学活动,生活天地狭窄,内心感想灵敏。诚如《寄居草》所云:“在我,缺少那一点粗犷的天性,常常把世界缩小到与我的身体相等,而整个的宇宙便像是我自己了。我顶喜欢从小小的缝隙去瞭望广大的原野”,从一方小窗仰望天空的浮云,俯视地面的惨剧,感慨着“美丽之中原孕育着无穷的残忍。人们时常企求那点美丽,却忘记了美丽以外的东西”。又如《寂寞里的吟咏》那样,孤寂中对身边景物倍生感情,对远别友人倍加怀念,咏叹着“现实是忧郁,幻想是快乐”,而任凭想象驰游,变物象为幻象,“若果有一天幻想和现实连系起来,那才是顶幸福的”,那时紫藤萝的沉郁悲哀颜色就变得“像树上槐花一样的白,像水里荷花一样的红,像地上野生的花草一样的蓝”,变得美丽耀目、生趣盎然了。他在《初春散记》中追寻春天的象征,既领悟“平常我们虽惯于在理想中过日子,然而实际觉来,理想即空虚,空虚即梦境,人生的岁月遂更值得珍惜,梦中的时光毕竟是短促的”,“惊觉自己是人间的一个过客,匆匆看见盛开的桃花”,又咏叹“冬日使我蛰伏了数不过来的光阴,也使我为朋友为人生而感到无穷的惆怅”,“在惆怅里我忆念着江南的春天,期待一声雁叫,等到看过雁飞,又给我心中一片淡漠,我的灵魂欲探险而不能,幻想中我是那‘人’字阵里的一员战士”,最终从溪边小孩身上看出“新生命”的生长,他们“把生命看得重,抬得高”,“这像荒凉中的一线生机:沙漠里的骆驼,古井里的水”。在这“没有春天”的地方寻觅春意,寄托



春思，曲折透露着内心的期待和向往。

林榕以上官蓉笔名发表的《散文闲谈——一年来的华北散文》<sup>⑥</sup>中，自评说：“慕容慧文，他整个散文的气息是多少接近一点诗的境界，这境界像由古典的诗词得来。我知道他最清楚，他初写散文的时候，是眷恋词曲的时代，那时的短文，自然间流露诗的意境；但后来他觉得这一传统的范围毕竟狭小，因此内容也渐扩大，他所企图阐发的是一点人生的真理，透过一个简短的事实本身，描画这事件以新颖彩色，所以散文外表有清淡的形体，就内容看有深颖意见。”他也是何其芳诗化散文的传人，在感性抒写、刻意画梦上有些相似，而不如《画梦录》的绮丽精美，在力求内容扩充上还难以达到“深颖”境地。他还发表《现代散文的道路》、《叛徒与隐士——现代散文谈》、《简朴与绮丽——现代散文谈之二》<sup>⑦</sup>等散文评论，张扬现代散文多样发展的传统，也为诗化散文的绮丽文风争得一席之地。

南星与林榕以诗为文，浅吟低唱，并非无病呻吟，也不痛哭喊叫，而是孤寂难耐，沉潜内心，在没有诗意的地方寻味诗的感兴，从自我感觉的层面体察“阴暗而庄严”的人生意味，以行吟独语、梦幻冥想、咏物抒怀、象征暗示等方式含蓄表达身处困境而心有别恋的幽微情思，字斟句酌地雕琢精致的象牙之塔，在唯美追求中脱俗入雅，造境自慰，体现了沦陷区散文艺术的诗化倾向和文艺青年的创作风尚。

前述八家散文代表着战时沦陷区散文书卷化、世俗化和诗化的三种主要倾向。书卷化随笔以周作为典范，世俗化絮语散文数张爱玲略胜一筹，诗化散文有南星等传承何其芳余脉，从知性、感性和诗性诸层面拓展散文随笔在敌占区艰难生长的空间。尽管有避重就轻之嫌，或有失节媚敌的污点，却有乱世遗民复杂难言的苦衷苦味和苦心吟咏，难以驯化的民族文化守望和自我个性表达，精心营构的象牙之塔和微雕艺术，聊以自慰自遣和自娱自足，在沦陷区特殊环境中形成了特有的普遍的苦吟风和苦涩味。这为战时中国散文多样性发展提供了别样的乱世哀音、遗民心曲和文体艺术，具有不可忽略的存在价值和文史意义。纪

果庵对当时环境和写作策略有自觉意识：“无论在什么地方，现在都不是有充分言论自由的时代，对于写散文及杂文，这是致命的打击”，“言论不能随意，说理要看情势，作文章的人只有逃避，绕弯子，也许把昔日的升平，当作甘蔗渣咬个不休，也许东抄西掠的弄作古今中外的东西浇自己的块垒，于是被人骂了，清谈，滥调，浅薄。清谈是可以误国的，滥调浅薄是不值一读的，但是没有人能够原谅其背后之不得已，也并没看见一个大胆的战斗，敢率直的陈述了大家的需要文章，——譬如像当年鲁迅先生那样，与打击者以打击。”<sup>⑧</sup>这固然带有为自己和同人辩解的意思，但也为人们解读沦陷期散文提出了要设身处地、知人论世的问题，理应引起史家和读者的深长思之。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现代散文学的中外整合与理论建构研究”（编号：09AZW001）的阶段性的成果之一]

①笔者于80年代前期参与先师俞元桂教授主编的《中国现代散文史》的编写工作，当时已搜罗一批沦陷区散文史料，限于主客观条件而未能入史，只在选编《中国现代散文理论》（1984）、《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散文卷》（1990）中收录一些选文，并在《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散文卷》（1993）著录所见沦陷区散文书目。此次修订该史著，补写此篇，选介各有代表性的八家散文，以见沦陷区散文的特定状态和主要倾向。

②苏青：《〈浣锦集〉与〈结婚十年〉》，《苏青文集》下册，第437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版。

③张爱玲：《我看苏青》，《天地》1945年4月第19期。

④苏青：《〈天地〉发刊词》，《天地》1943年10月创刊号。

⑤上官蓉（林榕）：《散文闲谈——一年来的华北散文》，《中国文艺》1943年第7卷第5期。

⑥该文评述1942年的华北散文，刊于《中国文艺》1943年第7卷第5期。

⑦分别刊于《中国文艺》1940年第3卷第4期，《风雨谈》1943年第1期、第5期。

⑧纪果庵：《散文杂文随谈》，《读书》月刊1945年3月第2期。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邢少涛